

蘇門文人私人建物記之美學意涵

蓋 琦 紓*

摘 要

唐宋雜記文中的私人建物記如亭臺堂齋軒為文人燕居優游之所，其精神空間的意涵往往超過建物的本身，尤其至宋代古文家的手上，記體得到充分發展，多數「亭臺堂齋軒」記具有濃厚的文學性質，提昇了唐宋古文的美感價值。

本文中的「蘇門」是指以蘇軾為首及其所領導的師友團體，尚包括蘇轍、黃庭堅、秦觀、晁補之、張耒等，凡六人，他們也是北宋哲宗元祐前後（盛宋時期）重要的文學團體，儘管彼此之間的文學風格不同，仍具有共通之處。他們的「亭臺堂齋軒」記流露了文人的精神意趣及人格境界，且他們多數篇章精於論理，略於寫景、記事，以論作記，促使「以善敘事為主」的記體散文產生新變，文中往往寄寓一段萬世不可磨滅之理，以此召喚、開示後代讀者的智慧，具宋代詩學中「尚意」、「主理」的美感特質。

關鍵詞：古文、記體、亭臺堂齋軒、蘇軾、宋代

一、前 言

記體散文可以說是唐宋古文新興的文體，明人徐師曾考察「記」體的淵源流變云：

〈禹貢〉、〈顧命〉，乃記之祖，而記之名，則昉於〈戴記〉、〈學記〉諸篇。

收稿日期：2005年4月18日，通過刊登日期：2006年4月19日。

* 作者係高雄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厥後揚雄作〈蜀記〉，而《文選》不列其類，劉勰不著其說，則知漢、魏以前，作者尚少；其盛自唐始也。¹

徐氏指出「記」體源於先秦的《尚書》、《禮記》，而「記者，乃紀事之文」，〈戴記〉、〈學記〉卻是論說體；王粲〈荊州文學記〉可以說是最早的記事之文，東漢馬第伯〈封禪儀記〉則為最早山水記景之作；至於東晉陶淵明〈桃花源記〉乃融合記事與記景，但非紀實之作。²兩漢魏晉六朝記體之作數量不多，故南朝蕭統《文選》、劉勰《文心雕龍》中尙未立「記」體一類，至中唐古文家手上才開始大量創作「記」體文。宋人姚鉉主編的《唐文粹》即收錄87篇，根據其題材尙小立17名目：古跡、陵廟、水石巖穴、外物、府署、堂樓亭閣、興利、卜勝、館舍、橋樑、井、浮圖、災沴、讌會、讌稿、書畫琴故物、種殖，³可知「記」體內容之駁雜。清人姚鼐的《古文辭類纂》裡，分文體為13類，姚氏將古代「記」體文稱作「雜記類」，所謂「記所紀大小事殊，取義各異」，⁴今人褚斌杰云：「古人將以『記』名篇的文章稱為『雜記文』」。⁵

在雜記各類題材裡，亭臺堂閣等建物記頗受後人留意，如錢穆曾指出唐人韓愈的〈燕喜亭記〉、〈新修滕王閣記〉之類，「已開宋詩境界矣」，且云：「宋人記亭閣，記齋居，皆摩空寄興，不為題材所限，尙有運詩入文之遺意，而宋人亦不自知也。」⁶錢氏以為韓愈、宋人的亭閣記以詩為文，具宋

-
- 1 明·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收入《文體序說三種》（臺北：大安出版社，1998），頁103。其引《金石例》曰：「記者，乃紀事之文」。
 - 2 王粲、馬第伯二文分別見於清·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後漢文》（臺北：世界書局，1982），卷91、29。陶文則見於楊勇，《陶淵明集校箋》（臺北：正文書局，1987），卷6，頁275-276。
 - 3 宋·姚鉉，《唐文粹》（臺北：世界書局，1972），卷71-77。而宋·李昉主編的《文苑英華》（臺北：大化書局，1985）中記體則分為宮殿、廳壁、公署、館驛、樓閣、城、城門（水門、橋、井）、河渠、祠廟（祈禱）、學校（文章）、釋氏、觀（院、尊像、童子）、宴遊、紀事、刻候、歌樂、圖畫、災祥、質疑、寓言、雜記等，名目瑣碎，且歸納分類的標準似乎不一。
 - 4 清·姚鼐，《古文辭類纂注》（臺北：世界書局，1972），目錄，頁19。
 - 5 褚斌杰，《中國古代文體概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第11章第2節，頁352。
 - 6 錢穆，〈雜論唐代古文運動〉，收入羅聯添編，《中國文學史論文選集（三）》（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9），頁993-1038。

詩境界。⁷又王水照云：

唐代韓、柳以後，「記」就突破了原來「敘事識物」的範圍，或借以議論感慨，或工於景物刻劃。到了宋代，進一步擴大了這種文體的社會內容，加強了它的文學因素，成為文學散文的一種重要形式。其中以亭樓臺院記和游記散文取得更大的成就。⁸

記體原本「以善敘事為主」，「蓋所以備不忘」，⁹如建物記往往以「建物」本身的興建過程及相關人事為主要內容，具應用價值；到了中唐韓愈、柳宗元手上，突破原有的限制，雜以議論、寄託感慨、描寫景物等等；而宋人又進一步拓展記體，使其不僅是純粹實際用途，更具有文學性，其中又以「亭樓臺院」等建物記和游記的成就最大。

本文將以北宋蘇門文人的「亭臺堂齋軒」記作為考察對象，文中所謂「蘇門」是指以蘇軾為首及其所領導的師友團體，包括蘇軾（1036-1101）、蘇轍（1039-1112）、黃庭堅（1045-1105）、秦觀（1049-1100）、晁補之（1053-1110）、張耒（1054-1114）等六人，¹⁰為宋哲宗元祐（1086-1093）前後重要的文學團體。¹¹宋神宗（1068-1085在位）熙寧五年（1072），歐陽修（1007-

7 可參見許銘全〈「變」「正」之間——試論韓愈到歐陽修亭臺樓閣記之體式規律與美感歸趨〉一文，文中析論韓愈至歐陽修古文家之亭臺樓閣記，以明清文體論者正／變說來論述錢穆所謂「運詩入文」、「開宋詩境界」，指出韓愈在亭臺樓閣記的突破，「正是將所謂純文學中的抒情主體帶進原來主實用用途的文體書寫之中」，使空間書寫等於自我書寫。《中國文學研究》19(2004.12): 25-66。

8 參見王水照，〈宋代散文的技巧和樣式的發展——宋代散文淺論之二〉，收入《王水照自選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5），頁421-431。

9 明·吳訥，〈文章辨體序說〉，收入《文體序說三種》，頁52。

10 蘇氏兄弟與黃、秦、晁、張四學士具有共通性情、志趣及類似的文藝理念、思想內涵、政治命運等，為蘇門的核心成員，可參見筆者博士論文「蘇門與元祐文化」（臺北：臺灣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2002），第1章。

11 宋·汪藻，《浮溪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四部叢刊正編本），卷17〈呻吟集序〉曰：「元祐初，異人輩出，蓋本朝文物全盛之時也。」〈柯山張文潛集書後〉云：「元祐中，兩蘇公以文倡天下，從之游者，公（張文潛）與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號四學士」，頁133、135。宋·釋惠洪，《石門文字禪》（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四部叢刊初編縮本）亦曰：「秦少游、張文潛、晁無咎，元祐間俱在館中，與黃魯直居四學士，而東坡方為翰林，一時文物之盛，自漢唐以來未有也。」卷27，頁306。兩人皆推舉元祐文學、文化為入宋以來的高峰，其中代表作家即是蘇門文人。

1072) 辭世，蘇軾繼承歐公所託付「文與道俱」的文學使命，¹² 成爲北宋中後期文壇的盟主，自此開啓「蘇門」的時代。蘇門文人一生相聚時間不長，卻以文章相知，以道義相期，成爲終生的師友。被列名蘇門六君子之一的陳師道（1053-1102）曾云：「退之作記，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¹³ 道出記體的「正」、「變」，由「善敘事」轉爲「專尚議論」，後山未明說始自何時、何人，不過藉由探討同時期的蘇門文人「亭臺堂齋軒」建物記的群體特色，進一步抉發其中可能蘊含的美學意義，或許由此可窺見宋代「記體」變異後所呈現的另一種風貌。

二、精神空間的表徵

「亭臺堂齋軒」等建物記的寫作大致興起於中唐，¹⁴ 逐漸成爲「記」體文中較常見的題材，誠如姜濤所說：「古人在建造或修葺亭臺樓閣，以及觀覽名勝古蹟時所寫的記」，「在六朝以前比較少見，至唐宋才作者漸多，作品日盛」。¹⁵ 由於「亭臺堂齋軒」多半爲私人燕息之所，文人常藉此空間書寫，寄託個人情志，其文學性往往超過實用性，褚斌杰在「臺閣名勝記」中指出這類記文，一般是刻石的，與古代碑文有源流關係，不過紀事頌功不是它的重點，「從其性質上講，實際上是些文學小品，它常常以議論風發，寫物狀景形象、生動，情味雋永，深厚取勝」，¹⁶ 說明了這類記文濃厚的文學性。

亭、臺、堂、齋、軒等建物就其建築特質及用途大致可分爲二：亭、臺在室外，用以登臨宴飲；堂、齋、軒多爲室內，可「宴賓客、閱圖書」，¹⁷ 藏

12 宋·蘇軾，《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63〈祭歐陽文忠公夫人文〉云：「公曰子來，實獲我心。我所謂文，必與道俱。見利而遷，則非我徒。」頁1956。

13 宋·陳師道，《後山詩話》，收入《歷代詩話》（臺北：藝文印書館，1991），頁185。

14 檢索清·董誥等編，《全唐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目錄，發現較早的私人亭臺記，有卷368，賈至（718-772）〈秋興亭記〉，卷382，元結（723-772）〈茅閣記〉、〈殊亭記〉、〈寒亭記〉、〈廣宴亭記〉等，頁120。

15 姜濤，《古代散文文體概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中將雜記文分成六類：人事雜記、名勝營造記、山水遊記、書畫器物記、托物寓意記、日記等，頁226。建物記屬「名勝營造記」。

16 褚斌杰，《中國古代文體概論》，頁353。

17 宋·張耒，《張耒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卷50〈雙槐堂記〉，頁772。

文人所蓄的書畫古物等等。蘇軾在〈雪堂記〉中云：「以臺觀堂，則堂爲靜。靜則得，動則失。」以臺、堂相對，一動一靜；又云：

游以適意也，望以寓情也。意適於游，情寓於望，則意暢情出，而忘其本也。雖有良貴，豈得而寶哉。是以不免有遺珠之失也。雖然，意不久留，情不再至，必復其初而已矣，是又驚其遺而索之也。余之此堂，追其遠者近之，收其近者內之，求之眉睫之間，是有八荒之趣。¹⁸

子瞻認爲登亭臺以游望，可「適意」、「寓情」，但「意暢情出」，卻「忘其本(心)」，所謂「動則失」；而堂可「安其居、樂其身」，¹⁹收其遠近於心內，可得「八荒之趣」。前文提及錢穆所云「記亭閣」、「記齋居」，似乎已區分二者的差異。總之，亭、臺等建物一般興建在室外空曠的高處，可供人登臨游覽；至於堂、齋、軒雖然也多半建築於清幽之處，乃爲日常起居場所之一，且建物的重心在室內空間，可放置圖書文物，文人置身其中，讀書齋居、觀玩古物、彈琴飲酒等等，或許無法享有登臨的游觀之美，²⁰卻可「舒心而養神」、「俯仰終宇宙」等等，更多了一份優游自在的風雅情趣。

我們可將蘇軾、蘇轍兄弟及其弟子黃庭堅、秦觀、晁補之、張耒的「亭臺堂齋軒」記作一統計，如下：

建物	蘇軾	蘇轍	黃庭堅	秦觀	晁補之	張耒
亭	6	2	4	0	1	1
臺	2	0	0	0	0	0
堂	10	3	8	0	6	3
齋	1	1	0	1	2	1
軒	0	2	0	1	0	1
合計	19	8	12	2	9	6

18 《蘇軾文集》，卷12，頁410-412。

19 同註17。

20 可參見柯慶明，〈從「亭」、「臺」、「樓」、「閣」說起——論一種另類的游觀美學與生命省察〉一文中云：「山水人文的勝景，不但提供了當下即是的美感之樂，而且提供了生命思索的環境與解決」，收入氏著，《中國文學的美感》（臺北：麥田出版社，2000），頁279-283。

這六位文人的「亭臺樓堂齋」記總計 56 篇，供登臨游觀的亭、臺記僅有 16 篇，而讀書燕居的堂、齋、軒記則多達 40 篇。後者明顯多過前者篇數，而在蘇門文人之前的歐陽修是九篇亭臺記、六篇堂齋記，曾鞏則有六篇亭臺記、三篇堂軒記，這二者比例的改變，頗令人玩味。亭、臺（樓閣）記多半體現登臨的游觀之美，而文人安居堂、齋、軒裡可收視返聽，凝神諦觀，或靜思坐禪，或閱圖書、觀文物，在記文中所反映文人的精神意趣絕不亞於游觀所得的自然美感。

其次，亭臺堂齋等建物記的命名多半以地理方位、姓氏地名、建物材質等來命名，如元結的茅閣，柳宗元的東亭、西軒、訾家洲亭，歐陽修的東齋、峴山亭，曾鞏的南軒、道山亭，王禹偁的竹樓、范仲淹的岳陽樓，蘇軾的蓋公堂、張氏園亭，蘇轍的東軒、武昌九曲亭等等；或富詩意如唐人賈至的秋興亭、獨孤霖的疊嶂樓，宋人歐陽修的叢翠亭、畫舫齋，晁補之的照碧堂、拱翠堂等等。此外，宋人對建物記的命名愈加講究，²¹其命名往往流露建物主人的心境，如蘇舜欽（1008-1049）〈滄浪亭記〉，亭名取自先秦民歌「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欲以此意作為仕宦溺人的自勝之道。²²而蘇門領袖蘇軾喜以雪命名，熙寧年間通判杭州時曾為法會院言師的東軒名之「雪齋」，秦觀作記云言師開此軒，「汲水以為持，累石以為小山，又灑粉於峰巒草木之上，以象飛雪之集」，子瞻愛之，以為「意趣湛妙」，可以「發人佳興」。²³蘇軾晚年守定州，築堂名之「雪堂」，記文中云：

堂以大雪中為之，因繪雪於四壁之間，無容隙也。起居偃仰，環顧睥睨，無非雪者。蘇子居之，真得其所居者也。

無論言師灑粉或子瞻繪雪，皆是人工造景，非自然的雪景，如子瞻所云「吾非取雪之勢，而取雪之意」、「以雪觀春，則雪為靜」，流露文人的精神意趣。又如張耒中年之際坐新舊黨爭謫復州，有書齋名「鴻軒」，記中假主客答

21 黃明理，〈淺談命名文學及其在北宋的開展〉，收入輔大中文系、中國古典研究會主編，《建構與反思——中國文學史的探索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2），頁 659-690。

22 宋·蘇舜欽，《蘇舜欽集編年校注》（成都：巴蜀書社，1991），頁 625-626。

23 宋·秦觀，《淮海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卷 38，頁 1219-1220。

問，客云鴻者「時其往來」、「高飛遠舉」，故能明哲保身，因而質疑主人在聖世遭貶謫，豈無愧於鴻？主人卻回答「居此以己卯之秋，其遷也庚辰之春」，²⁴與在陂澤中獵食以活，秋至春去的鴻者乃同類也，文潛不用鴻者高飛避害之意，卻以仕途忽貶忽遷，表達文人在黨爭傾軋下身不由己的無奈與不平。至於晁補之〈清美堂記〉為王景亮所命名，文中記王君不滿前人柳宗元〈愚溪對〉一文中與溪神的對話，子厚名「愚溪」而居，夢見溪神云：「余甚清且美」，王君以為「凡物之清且美而可悅者甚眾也」，「且物之清惟其自然，宜不以人之所處要地僻壤改其度也」，故建堂名之「清美」。無咎於是歎之云：

昔之君子盡則急於功名，不暇擇當否，退而慙不逢，則誣溪谷草木以自解說，豈不過甚矣乎？若景亮進不干時，退而處其常，斯可近矣。²⁵

言士人的進退出處，不以遷謫為意，自然「清美而可悅者」甚眾，賦予「清美堂」深刻的精神內涵。此記作於元祐二年（1087），無咎於京師任館職，仕途雖順遂，仍以王君「進不干時，退而處其常」自警，更寄望它日「過景亮臨斯泉一醉，解吾纓而濯之」，洗去官場的污濁。

此外，蘇門文人建物記的命名，或與個人心性修養有關，如蘇軾思堂、靜常齋，蘇轍的直節堂、浩然堂，黃庭堅的資深堂、整暇堂、養正堂，晁補之潛齋、近智齋，張耒的進學齋等等。有些命名則具玄澹超逸的意趣，如子瞻的墨妙亭、放鶴亭、凌虛臺、超然臺、醉白堂、雪堂、眾妙堂、觀妙堂，子由的清虛堂、待月軒，山谷的松菊亭、自然堂，少游的閑軒、雪齋，文潛的鴻軒、冰玉堂、素絲堂，其中鶴鴻、松菊、雪月、冰玉、素絲等意象，具高潔脫俗的美感。

三、歷史人文意識的強化

「亭臺堂齋軒」的建造多半在風景清幽之處，週遭的地理景觀往往是這類建物記中的重要角色，自然山水的刻劃豐富了建物記的形象美感，亦寄託文

24 同註17，卷49，頁767。

25 宋·晁補之，《雞肋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四部叢刊初編縮本），卷37，頁199-200。

人的情志，如宋人范仲淹（989-1052）〈岳陽樓記〉即以寫景著名，歐陽修〈醉翁亭記〉、蘇舜欽〈滄浪亭記〉情景相生等等，皆描寫山水自然之美，為一篇篇優美的文學散文。²⁶而韓愈〈新修滕王閣記〉、歐陽修〈岷山亭記〉等則避寫周圍山川景色，或抒寫不得造訪的感慨，或譏諷古人杜預、羊祜之好名。²⁷至於蘇門文人的私人建物記，自然山水乃明顯淡化了，甚至消失，即使出現也多半與歷史陳跡並置，或只有古人遺跡，強化了歷史人文意識。

自然山水與歷史陳跡並置是中國懷古詩常出現的結構，以自然永恆與人事滄桑作對比，透露悲涼的時間意識，或凸顯人生短暫、歷史無情；或讓歷史人物走進永恆的山水自然，獲得永恆生命。²⁸如蘇轍〈快哉亭記〉先言自然山水，再敘歷史陳跡：

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湧，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沒於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翫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煙消日出，漁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為「快哉」者也。至於長州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騁驚，其流風遺跡，亦足以稱快世俗。²⁹

登臨「快哉亭」覽觀江流之勝，先寫長江的遼闊、濤瀾風雲變化，晝夜景色則取江上的舟楫出沒，江下的魚龍悲嘯；描寫武昌諸山，則言山陵、草木、日出、野舍，寥寥數筆簡單勾勒，之後與三國流風遺跡並置，以為二者皆可稱快，這些英雄豪傑彷彿與自然山水同樣具有永恆的意義。至於晁補之〈照碧堂記〉中則先鋪敘三面所眺望的歷史陳跡：

其南汴渠起魏迄楚，長堤迤靡，風檣隱見，隋帝之所以流連忘返也；其西商丘祠，陶唐氏以為火正，曰閼伯者之所以有功而食其墟也。其東雙廟，唐張

26 何寄澎，〈歐陽修古文作法探析〉：「觀歐陽修雜記之作，予人印象最深刻者，厥為修辭遠較他類作品為峭麗，駢句遠較他類作品為繁多，且四言句型極為常見。」收入氏著，《唐宋古文新探》（臺北：大安出版社，1990），頁173-220。文中曾舉出〈畫舫齋記〉、〈豐樂亭記〉、〈叢翠亭記〉、〈李秀才東園亭記〉等私人建物記的峭麗文句為例，文學性濃厚。

27 唐·韓愈，《韓昌黎文集校注》（臺北：華正書局，1986），頁53-54。宋·歐陽修，《歐陽修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頁588-589。

28 參見蕭馳，《中國詩歌美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頁131-133。

29 宋·蘇轍，《蘇轍集·樂城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卷24，頁409。

巡、許遠捍城以死，而南霽雲之所以馳乞救於賀蘭之塗也。而獨梁故苑複道屬之平臺三十里者，名在而跡莫尋，雖隋之疆亦其所穿渠在耳，豈汰靡者易熄，而勳名忠義則愈遠而彌存？³⁰

有隋帝流連的汴渠，祭祀主商星的闕伯及唐代將領張巡、許遠的祠廟；不過補之未見梁朝長達三十里的平臺遺跡，不禁感慨繁華如夢，煙消雲散，不如人的勳名忠義，與天地日月長存，寄託個人的理想。又晁氏「拊檻極目」所見的自然風光，則是：

天垂野盡，意若遐驚太空者，花明草薰，百物媚嫵，湖光瀾漫，飛射堂棟，長夏畏日，坐見風雨自堤而來，水波紛紜，柳搖而荷靡，鷗鳥盡舞，客顧而嬉。

望天地之闊遠，精神超越形體的侷限，遨遊無垠的太空，沉醉花草湖光，湖畔柳枝搖曳，湖面荷花迤邐，登堂的游觀之美，令此刻「謫官於宋」的補之「寵辱皆忘」，忘機與鷗鳥相嬉，追求「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合一」之境。

而蘇軾的私人建物記，對自然山水的著墨甚少，〈放鶴亭記〉中曰：「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俯仰百變」，僅寫草木、雪月，天地相接，遼闊無盡，至於四季陰陽的景色，僅以「俯仰百變」輕輕帶過，富有寫意性。之後卻引《易》、《詩》的「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鶴鳴於九臯，聲聞於天」，³¹比附賢人君子、隱德之士，又舉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之例作對比，寓意深遠。又作於密州〈超然臺記〉，子瞻與客「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曰：

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廬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³²

南邊的馬耳、常山若隱若現，蘇軾關心卻是隱君子之足跡；接著緬懷古人盧敖、師尚父、齊桓公、韓信，之後則云：「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

30 同註25，卷29，頁195。

31 宋·蘇軾，《蘇軾文集》卷11，頁360-361。

32 同上註，頁352。

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余未嘗不在。」僅以冬溫夏涼道出「超然臺」的安適舒爽，至於四季陰晴晝夜景色的變化，文中未見描述，卻云「余未嘗不在」，給人無限想像空間。蘇軾通判杭州為太守陳公作〈凌虛臺記〉，儘管周圍臨山，子瞻「與公登臺而望」，不言游觀之美，卻云：

其東則秦穆之祈年、蠡泉也，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計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髣髴，而破瓦頽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為禾黍荊棘丘墟壠畝矣，而況於此臺歟？³³

當年「宏傑詭麗」的帝王宮苑，數世之後不但「破瓦頽垣」未存，且化為「丘墟壠畝」，而簡陋的「凌虛臺」又如何對抗歲月的侵蝕呢？最後以「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臺之存亡也」作結，具勸諫諷諭之意。

四、人格襟懷的流露

明人吳訥曾云：「記營建，當記日月之久近，工費之多少，主佐之姓名，敘事之後略作議論以結之，此為正體。」³⁴此一正體乃以「物」為主，多作客觀的實錄。然而誠如前文所述，「亭臺堂齋軒」多半為私人燕息之所，文人常藉此空間書寫，寄託個人情志，如韓愈〈燕喜亭記〉為同貶謫連州的王仲舒撰亭臺記，以自然山水比附王氏之德，³⁵范仲淹〈岳陽樓記〉表達個人崇高的政治理想等等，蘇門文人除此之外，又多以人物的心性修養、人格境界為重心，提升自我的生命意識。蘇軾〈喜雨亭記〉乃作於嘉祐年間初仕鳳翔府簽判之際，文中並未著墨登亭攬勝，而是敘述建亭的因緣，言「彌月不雨，民方以為憂」，越三月，兩場雨「民以為未足」，至大雨三日「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抃於野，憂者以樂，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³⁶抒寫欣喜感恩的心情，文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強烈的憂喜意識，愛民的

33 同上註，頁350-351。

34 明·吳訥，〈文章辨體序說〉，收入《文體序說三種》，頁52。

35 同註27，頁48-49。

36 宋·蘇軾，《蘇軾文集》卷11，頁349。

胸懷。張耒〈雙槐堂記〉為酸棗令王君所作，言其「治邑有能名」，於政暇之餘作燕居之堂，「與賢士大夫彈琴飲酒，歡欣相樂，舒心而養神，使其中裕然」，道出王君與賢者相從之樂，在於「舒心養神」，使治邑「暇佚而有功」，追求古循吏的典範。³⁷黃庭堅〈冀州養正堂記〉言扶風魯侯「忠信豈弟，不鄙其州，拊循鰥寡，動用禮法。民奮於田，士興於學，迺暇於燕息之地」，亦在治邑有功之餘築堂，且云：「魯侯隱几以休詩書，酌酒以御賓客，巾履徜徉木陰鳥語之中，思所以為邦之本，而有得焉」，燕居與治政似乎密不可分，所謂「律民者在己，得己者在心」，「不以一日忘所以養源者」，故魯侯自名之曰「養正堂」，³⁸本記言及宴飲之樂，亦強調儒家的人格修為。

元豐四年蘇轍謫居筠州期間，曾為吳君「浩然堂」作記，子由引水比喻「浩然之氣」云：

今夫水無求於深，無意於行，得高而渟，得下而流，忘己而因物，不為易勇，不為險怯。故其發也，浩然放乎四海。古之君子，平居以養其心，足乎內，無待於外，其中潢漾，與天地相終始。止則物莫之測，行則物莫之禦。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憂。行乎夷狄患難而不屈，臨乎死生得失而不懼，蓋亦未有不浩然者也。故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³⁹

言水可「忘己而因物」，故能「浩然放乎四海」，而古代君子涵養其心深厚，能不憂不懼、不屈不撓，而與天地渾為一體，達到儒家「天人合一」的境界，也表達身居憂患中的士人風骨。黃庭堅晚年貶謫戎州之際，為張仲吉作〈綠陰堂記〉，文中書「游息之樂」，可以說是一篇優美的小品文，全文以敘事為主，不雜議論，云：

其子寬夫又從予學，故予數將諸生過其家。近市而有山林趣，花竹成陰，嘯鳥鳴蛙，常與人意相值。或時把酒至夜，漏下二十刻，雲陰雷風，與諸生衝雨踏泥而歸。諸生從予，未嘗有厭倦焉，則仲吉父子好士喜賓客可知也。⁴⁰

37 褚斌杰，《中國古代文體概論》，頁353。

38 宋·黃庭堅，《黃庭堅全集·正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卷16，頁426-427。

39 宋·蘇轍，《蘇轍集·樂城集》卷24，頁408-409。

40 同註38，別集卷2，頁1494。

山谷時攜諸生前往張氏「綠陰堂」宴飲，把酒至夜晚，在「雲陰雷風」中，師生「衝雨踏泥而歸」，未嘗有厭倦之意。蘇軾曾謂歐陽修、梅堯臣能「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且以孔門師生為喻，「夫子之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者，則亦足與樂乎此矣」，⁴¹道出孔子與賢者的相從之樂，其中蘊含了「安貧樂道」意識。山谷此記未表現貶謫之憤懣，藉敘「游息之樂」表達作者從容自得的心境，超越逆境，凸顯山谷剛健高潔的品格。

蘇軾〈超然臺記〉作於熙寧年間，子瞻在朝與王安石議政不合，自京師外放，四處游宦，自錢塘移守膠西的次年修葺了「超然臺」，其云初到密州，「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樂也，處之暮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提及吏事繁重、生活困頓，子瞻卻不因此勞苦憔悴，反而更加神采奕奕，文中雖亦言「余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的相從之樂，但更強調「游於物之外」的超然自得。元豐年間蘇軾以待罪之身謫居黃州，於武昌築「九曲亭」，儘管不得簽署官事，但蘇軾記文中仍道出「山中有二三子，好客而喜游，聞子瞻至，幅巾迎笑，相攜徜徉而上，窮山之深，力極而息，掃葉席草，酌酒相勞」，與民相從之樂。不過文中子由卻回憶一段與子瞻的年少之游，言其兄「翩然獨往，逍遙泉石之上，擷林卉，拾澗實，酌水而飲之，見者以為仙也」，捕捉其超逸脫俗的神采，文後曰：

蓋天下之樂無窮，而以適意為悅。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之。及其既厭，未有不洒然自笑者也。譬之飲食雜陳於前，要之一飽而同委於臭腐。夫孰知得失之所在？惟其無愧於中，無責於外，而姑寓焉。此子瞻之所以有樂於是也。⁴²

言子瞻之「所以有樂於是」在於「無愧於中，無責於外」，不以貶謫累於心，因此，中年謫居之游與少年之游，不同年紀與心境，其「適意」之樂一致，此二記皆表現蘇軾超逸脫俗的人格境界。蘇軾為謫居齊安的張夢得「快哉亭」作記，稱許張君「不以謫為患」，而「自放山水之間」，否則，「連山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睹其為快也哉」？以為其過人之處即在於「其中坦然，不以物傷

41 宋·蘇軾，《蘇軾文集》，卷 48〈上海直講書〉，頁 1385-1386。

42 同註 39，卷 24，頁 406-407。

性，將何適而非快？」其無所往而不樂的旨趣與超然臺、九曲亭二記相通，即在於「適意」，亦表現建物主人超逸的人格美。

又蘇轍曾為南康太守徐望聖「直節堂」作記，記其命名之緣由在於庭中的「八杉」，其「長短鉅細若一，直如引繩，高三尋而後枝葉附之，岌然如揭太常之旗，如建承露之莖，凜然如公卿大夫高冠長劍立於王庭，有不可犯之姿」，以為「杉能遂其性，不扶而直。其生能傲冰雪，而死能利棟宇者，與竹柏同，而以直過之」，彰顯杉之「直」勝於「竹箭之良，松柏之堅」，⁴³藉此比喻君子「特立不倚」的品格。又子由於元豐年間謫監筠州鹽酒稅，曾自「闢聽事堂之東為軒，種杉二本，竹百箇，以為宴休之所」，⁴⁴選擇種植杉、竹，表達對「高風亮節」人品的自期。蘇軾曾為其表兄文同作〈墨君堂記〉，與可善畫墨竹，以竹為君，「雍容談笑，揮灑奮迅而盡君之德」，有「稚壯枯老之容，披折偃仰之勢」，言與可畫竹：

風雪凌厲以觀其操，崖石犖确以致其節。得志，遂茂而不驕；不得志，瘁瘠而不辱。群居不倚，獨立不懼。與可之於君，可謂得其情而盡其性矣。⁴⁵

以君子品格節操比喻竹的特性，與可、墨竹二者似乎合而為一。

蘇門文人的建物記既以人格意識為重，雖不無頌美之意，但並非泛泛的歌功頌德，而是揭示理想的人格境界，如蘇軾〈醉白堂記〉為韓公（琦）作，韓取白居易〈池上〉詩語，命名「醉白堂」，子瞻在文中將韓公與白氏作比較，以為就治國安邦而言，白不如韓；若縱情山水之樂，韓不如白，而二人共同處在於：「忠言嘉謨，效於當時，而文采表於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古人。」

最後子瞻又云：

方其寓形於一醉也，齊得喪，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與造物者遊，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⁴⁶

指出韓公在酒醉時，對得失、禍福、貴賤、賢愚等同視之，上與造物者遊，達到莊子「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合一」境界，對「醉白」作出絕妙的釋

43 同上註，頁411。

44 同上註，卷24〈東軒記〉，頁405。

45 《蘇軾文集》卷11，頁355-356。

46 同上註，卷11，頁344-345。

名，亦寄託對逍遙自在之境的追求。又如黃庭堅為同郡僧人惠言之堂室命名「自然」，又作記釋名云：

動作寢休，頽然於自得之場，其行也不以為人，其止也不以畏人，時損時益，處順而不逆，此吾所謂自然也。⁴⁷

山谷所謂安時處順、「頽然自得」的神態，為佛老、亦是山谷所追求的精神境界。

由上述可知，蘇門文人在「亭臺堂齋軒」記中所表現的人格襟懷，來自儒家經世致用、樂道精神，及道家的齊物思想、沖虛心靈，尤其逍遙自在、與道冥合之境可以說是蘇門文人最嚮往的人格境界。

五、萬世不可磨滅之理的彰顯

在蘇門文人之前「亭臺堂齋軒」記，多以敘事和抒情作結合，如寄情山水排遣抑鬱的蘇舜欽〈滄浪亭記〉，歐陽修〈李秀才東園亭記〉則抒發世事多變的感慨，充滿懷舊情思。⁴⁸而曾鞏〈清心亭記〉卻論性命之理，⁴⁹之後蘇門文人的私人建物記亦多以議論為主體，可謂精於論理，略於記事、寫景，或以「理」遣情，或以「理」自警勉人等等，往往寄託一段萬世不可磨滅之理，⁵⁰蘇軾在〈墨妙亭記〉後即云：「是亭之作否，無足爭者，而其理則不可以不辨。」⁵¹「理」的意義與價值竟超越建物的本身，文中闡述「知命者，必盡人事，然後理足而無憾」，乃儒家所謂「盡人事，聽天命」之理。其

47 《黃庭堅全集·正集》，卷 17 〈自然堂記〉，頁 456。

48 歐陽修一文見《歐陽修全集》，頁 932-933。

49 宋·曾鞏，《曾鞏集》（北京：中華書局，1998），頁 296。王基倫〈曾鞏文之體類區分及其意義〉：「曾鞏雜記的最大特色，即在於能『議論』能『說理』，並援引唐順之、茅坤評〈清心亭記〉語：「此記與〈醒心亭記〉，所謂說理之文。子固於諸家尤所擅長」為證。收入氏著，《唐宋古文論集》（臺北：里仁書局，2001），頁 145-191。

50 宋·謝枋得，《文章軌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四庫全書珍本）評點宋人李觀〈袁州學記〉云：「此等文章關係世教，萬世不磨滅」，今人楊慶存指出宋代記體散文有四大特點，一是立意高遠，言宋人兼重意理，輔以議論，昇華意識，所謂「必有一段萬世不可磨滅之理」。收入王水照編，《宋代文學通論》（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2000）「題材體裁篇」，第 3 章〈宋文題材與體裁的繼承、改造與開拓、創新〉，頁 476。

51 宋·蘇軾，《蘇軾全集》卷 11，354-355。

「理」往往具有普遍、恆久性。換言之，蘇門文人以論作記，「主理」可以說是他們建物記的重要特質。

張耒〈思淮亭記〉於官居福昌時所作，文潛「時時慨然南望，思淮而莫見之」，於是易亭之故名，曰「思淮」，全文雖然不脫先寫景，次敘事，最後議論的傳統寫法，不過以理遣情的意味濃厚：

夫士雖恥懷其故居，而君子之於故國也，豈漠然若秦越之人哉！……君子不敢樂其所私而無志於天下，故自其壯也，則出身委質，奔走從事於四方，以求行其學。至安其舊而樂其習，豈與人異情哉！特與懷土而不遷異耳。夫棄故而不念，流寓而忘返，則必薄於仁者也。……且夫懷居而不遷，流寓而忘返者，均有罪矣。然與其輕棄其舊也，則累於所習者，不猶厚歟？⁵²

其論述「懷居而不遷」與「流寓而忘返」之差異，且以「仁」為論點，以為二者雖有罪，不過前者較後者為「厚」，換言之，有仁心之君子必不「輕棄其舊」，寄寓其思鄉的情思。又蘇轍〈東軒記〉作於謫監筠州鹽酒稅時，「關聽事堂之東為軒」，以為宴休之所，卻因吏務繁重，鎮日奔波，無法安於東軒，此時子由終於了解顏回之所以甘心貧賤，不肯求「斗升之祿」以自給，正因「害於學」，也領悟到士人以「沉酣勢利」、「玉帛子女自厚」為樂，乃「未聞大道」，且云：

及其循理以求道，落其華而收其實，從容自得，不知夫天地之為大與死生之為變，而況其下者乎？故其樂也，足以易窮而不怨，雖南面之王，不能加之，蓋非有德不能任也。

子由年十九即進士及第，四十一歲貶謫筠州，首度嘗到仕宦挫敗滋味，開始覺察到往日所得名利非真樂，唯有「循其理以求道」，充實德性，並希冀來日能「歸伏田里，治先人之敝廬，為環堵之室而居之」，追求顏子的安貧樂道，「懷思東軒，優游以忘老」，可謂以理遣情，以道自重。

蘇門文人的「亭臺堂齋軒」記多半為他人所作，卻不流於泛泛應酬，往往具勸勉之意。如黃庭堅的建物記中，常藉由命名、釋名「勉人以理」，且以議論發端：

無事而使物，物得其所，可以折千里之衝，之謂整；以實擊虛，彼不足而我

52 宋·張耒，《張耒集》卷49，頁768-769。

有餘，之謂暇。夫不素備而應卒，可以傲倖於無患；而顛沛狼戾者，十常八九也。豈唯人事哉！天之於物，疾風震雷，伏於土中皆萌動，然後阜藩而成夏；落其實而枯其枝，然後閉塞而成冬。夫惟整能暇，上天之道也。（〈閩州整暇堂記〉）

待外物而適者，未得之，憂人之先之也；既得之，憂人之奪之也。故雖有榮觀，得之亦憂，失之亦憂，無時而樂也。自適其適者，無累於物，物之去來，未嘗不樂也。故古之人觀乎儻來若寄、於我如浮雲之外物，亦正其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北京通判廳賢樂堂記〉）⁵³

前者為閩中太守魚仲修所作，魚氏「在官二年，內明而外肅，吏畏而民服，乃作堂以燕樂之」，問名於黃庭堅，山谷曰：「若魚侯，可謂能整能暇」，故命名「整暇」，「所以美其成功而勸其未至」，暗示魚侯不可以目前情況自滿，須「無事而使物」、「以實擊虛」，所謂「好整以暇」也，文後又曰「前所敘說，以告後人」，不僅勸勉魚侯，亦戒之後人。至於後者則為北都留守賈春卿的新堂命名、釋名，一開始即寄以「自適其適者，無累於物」的超然物外之理，藉此嘉勉賈君，而賈君敏於政事，「使節京西，吏畏其明」，卻失職，山谷「以議法不合，不以不稱職也」為之抱屈，寄慰勉之意。文中且云：「我名斯堂，既嘉主人賢，又以為來者之勸也」，似乎有垂教後世之意。

至於秦觀〈閑軒記〉中的「閑軒」為徐大正燕君之地，「去軒數十里」有田自足，於是徐君有歸隱之意。秦觀在文中則發議論：

士累於進退久矣！弁冕端委於廟堂之上者，倦而不知歸；據莽蒼而佃，橫清冷而漁者，閉距而不肯試，二者皆有累焉。⁵⁴

論士人的進退出處，指出在朝不願退隱或在野不願出仕皆非，認為「少舉進士」的徐君以「精悍之姿，遇休明之時」，卻「欲就閑曠，處幽隱」，「竊為君無可取也」，且賦詞招之，「膏君車兮秣君馬，軒之中兮不可以久閑」，一反「閑軒」命名之意，目的在勸勉期許徐君。此記作於元豐八年（1085），少游年三十七，三試科舉，終於及第，故此記勉人亦有自勉之意。而晁補之在飽嘗仕宦後，為竇君所作〈拱翠堂記〉中則云「功名可求也，其成有命」，⁵⁵道出仕

53 宋·黃庭堅，《黃庭堅全集·正集》卷16，頁425-426、428-429。

54 宋·秦觀，《淮海集箋注》卷38，頁1229-1230。

55 宋·晁補之，《雞肋集》卷30，頁197-198。

宦進退之理，所謂「成功在天」，以理排遣貶謫之抑鬱不平。蘇轍曾為王鞏的「清虛堂」作記，「凡遊於其堂者，蕭然如入於山林高僧逸人之居，而忘其京都塵土之鄉也」，然而子由採問答手法辯難之，或曰：「此其所以為清虛者耶？」客曰：

不然。凡物自其濁者視之，則清者為清。自其實者視之，則虛者為虛。故清者以濁為污，而虛者以實為礙。然而皆非物之正也。蓋物無不清，亦無不虛者。雖泥塗之渾，而至清存焉。雖山石之堅，而至虛存焉。⁵⁶

子由論萬物本體無不清虛，唯有「清濁一觀」、「虛實通體」，然後「與物無匹」，才有「至清且虛」者。緊接說王君生於世族，卻「棄其綺紈膏粱之習」，而「跌蕩於圖書翰墨之囿」，對古人「翰墨逸跡」贖之傾囊不厭；然而及其年長，「顧疇昔之好，知其未離乎累也」，於是「投之與人而不惜」，「將曠焉黜去外累而獨求諸內，意其有真清虛者在焉」，子由卻曰「未之見也」，頗不以為然，且請王君問其丈人張公，因張公能「超達遠驚，體乎至道而順乎流俗」，其責善之意頗濃厚。

又蘇軾〈寶繪堂記〉、〈墨寶堂記〉分別為王晉卿、張希元所作，兩人皆好書畫，蓄古今人遺跡甚多，於是築堂藏之。不過這兩篇記文的旨趣卻迥然不同，〈寶繪堂記〉開頭即曰：

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樂，雖尤物不足以為病。留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病，雖尤物不足以為樂。⁵⁷

子瞻以「寓意」為正，「留意」為反，認為書畫足以悅人不足以移人，但若「留意而不釋」，則禍患無窮。又舉己為例，言其少時喜好書畫，得失心重，後自覺「顛倒錯繆失其本心」，於是雖仍蓄之，但為人取去，亦不復惜，就如同「煙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豈不欣然接之，然去而不復念也」，自此「二物常為吾樂而不能為吾病」，文中勸戒之意頗明顯。至於〈墨寶堂記〉首段卻以「笑」字展開聯想，生發議論，分別舉出好聲色、書畫、文章、功名等人，他們相互嘲笑對方，自認高明，子瞻卻不以為然：「人特以己之不好，笑人之好，則過矣」。文後云今張君「位不稱其才」，優游終歲，以書自娛，

56 宋·蘇轍，《蘇轍集·樂城集》卷24，頁407-408。

57 蕭馳，《中國詩歌美學》，頁356-357。

但認為其非久閑者，「蓄極而通，必將大發之於政」，卻又云「君知政之費人也甚於醫」、「以余之所言者為鑒」，對照前文的蜀諺：「學書者紙費，學醫者人費」，⁵⁸頗耐人尋味，似乎暗示喜好書畫不過花費財物，但治理政事須以民為重，否則害人更甚於醫者。

蘇門文人除了為他人建物作記外，亦有個人的「亭臺堂齋軒」記，登臨的亭臺記只有蘇軾〈喜雨亭記〉、〈超然臺記〉，蘇轍〈武昌九曲亭記〉，如前文所云流露建物主人的人格襟懷，其他多半是讀書齋居的「堂齋軒」記，如蘇軾〈雪堂記〉、〈觀妙堂記〉、〈靜常齋記〉，蘇轍〈東軒記〉、〈遺老齋記〉、〈待月軒記〉，張耒〈進學齋記〉、〈鴻軒記〉及晁補之〈潛齋記〉等。張耒論道、學，所謂「士之學未至而道未立」，其云：

安居無事，精思而深念之，矯揉其心志，調伏其性情，觀天地之道，察萬物之理，以究道德之微妙，而通其性命死生之始終者，亦未始有頃刻之休，是故其德日進而不可止。⁵⁹

言道之高遠、精微，上可通「性命死生」之道，下可察「萬物之理」，學之，「內以修身，外以治人」。子由〈東軒記〉亦云「循理以求道」，「不知夫天地之為大與死生之為變」，其樂也「足以易窮餓而不怨」，揭示士以學道自重。無咎〈潛齋記〉以主客問答體論辯「潛」之真義，引《易》：「雷在地中，復此天地之潛也，而陽氣已動乎黃泉矣。」所謂「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因此，晁氏指出「不能靜者不能動，不能處者不能出」，又謂「回、憲潛於道，故闇然而日彰」，其所謂「潛將以為不潛者」。⁶⁰至於子瞻〈靜常齋記〉一開始即釋名曰：

虛而一，直而正，萬物之生芸芸，此獨漠然而自定，吾其命之曰靜。渺而藏，萬物之逝滔滔，此獨且然而不忘，吾其命之曰常。⁶¹

秦觀曾與他人云「蘇氏之道，最深於性命自得之際」，⁶²其「性命自得」似乎來自虛靜的本體，像本文中的「此獨」漠然自定、且然不忘，東坡名「靜」、

58 同上註，頁358。

59 褚斌杰，《中國古代文體概論》，頁780-782。

60 同註25，卷31，頁207-208。

61 宋·蘇軾，《蘇軾文集》卷11，頁363-364。

62 宋·秦觀，《淮海集箋注》，卷30〈答傅彬老簡〉，頁981。

「常」；又其〈觀妙堂記〉假託不憂道人、歡喜子對答，前者云：「沉寂湛然，無有喧爭，嗒然其中，死灰槁木，以異而同，我既名為觀妙矣」；後者卻云「不說不觀，了達無礙，超出三界，入智慧門」，「蕭然是非，行住坐臥，飲食語默，具足眾妙，無不現前。覽之不有，卻之不無，倏知覺知，要妙如此」，⁶³充滿佛老話語，蘇氏之道儒、道（佛）可謂互補，如東坡在〈南華長老題名記〉中所云：「論儒釋不謀而同者以為記」。⁶⁴作於紹聖元年（1094）知定州的〈雪堂記〉亦採主客問答法辯難之，假託客告之「散人之道」：「避眾礙而散其智者也」，質疑子瞻為名、智等所蔽，而邀子瞻為「籬外之游」，子瞻卻云：「子之所言者，上也。余之所言者，下也。」「我以子為師，子以我為資，猶人之於衣食，缺一不可」，又作歌曰：「感子之言兮，始也抑吾之縱而鞭吾之口，終也釋吾之縛而脫吾之鞵」，體現「與道冥合」的境界，與二十年前的〈超然臺記〉相較，同樣追求超脫之境，但〈雪堂記〉言理更玄奧。蘇轍晚年作〈待月軒記〉，一開頭即言昔遊廬山，有隱者告之「性命之理」：「性猶日也，身猶月也」，以日永恆不變比喻「性」，月之盈闕喻「身」，論辨性命之理，其中云：

出生入死，出而生者未嘗增也，入而死者未嘗耗也，性一而已。惟其所寓，則有死生，一生一死身也。雖有生死，然而死此生彼，未嘗息也。⁶⁵

其所謂「性」應指道之本體，具永恆不變之特性。

此外，某些建物記則寄寓一段「藝文」之理，如黃庭堅「盡書杜子美兩川夔峽諸詩」刻石藏於蜀人楊素翁家，命名「大雅堂」，且作記曰：

子美妙處，乃在無意於文。夫無意而意已至，非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闖然入其門邪！⁶⁶

稱許杜甫晚年的夔州詩，其所謂「無意於文」正是山谷一生致力追求的境界。又如蘇軾〈眾妙堂記〉為廣州崇道大師何德順「眾妙堂」作記，文中所云「是技與道相半，習與空相會，非無挾而徑造者也」之理，⁶⁷雖非專為藝

63 同註61，卷12，頁404。

64 同註61，卷11，頁393-394。

65 宋·蘇轍，《蘇轍集·樂城三集》卷10，頁1239。

66 明·吳訥，《文章辨體序說》，《文體序說三種》卷16，頁437。

67 同註61，卷11，頁362。

文創作所發，卻成爲蘇軾「技道兩進」、「技進於道」文藝理念之佐證。

宋人王禹偁（954-1001）作〈黃州新建小竹樓記〉，寄望「後之人與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也」，⁶⁸竹樓之易朽，但刻於石上的「記」文卻不易磨滅，後人見「記」，或感竹樓風雅情趣，或理解竹樓主人身處逆境，仍怡然自得的心志，重新修葺竹樓，使其不朽。王氏一文似乎透露宋人頗自覺藉作「記」來傳達對永恆不朽的強烈企圖。自魏文帝於《典論》〈論文〉中揭示「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⁶⁹肯定詩文創作的崇高價值，並賦予其永恆意義後，此文學觀影響後代甚鉅。相較於前代，宋代文人似乎對永恆不朽具有更強烈的想望與追尋，蘇軾曾引歐陽修所云：「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貴賤也。」並多次在與他人書簡中強調「文章如金玉」、「文章如金玉珠貝」，⁷⁰重視文章的永恆意義與價值。或許因爲如此，蘇門文人對鑄於金石，不易磨滅的「記」文寄予深刻期許，如黃庭堅〈鄂州通城縣學資深堂記〉中論孟子所云：「君子深造之以道，欲自得之也。」藉「表章鄒君之意，以曉諸生」，山谷不述資深堂之「挈楹計工」、「襟帶溪山之觀」，卻以警世口吻云：「夫教者欲速效而不使人自得之，學者欲速化而不求自得之，皆孟子之罪人也。」⁷¹又如晁補之〈近智齋記〉引孔子「好學近乎智」，大論爲學之效用廣大無邊，所謂「學造其極則無不知，故智之爲言，惟好學爲能近」，以勉勵與己相從八年的袁君，至於「棟牖花竹起居之佚，視聽之適，則不足道也」，⁷²黃、晁二子在文中特別說明不言建物的工程或地理景觀，而是以「理」勉今人，甚至召喚、啓示世世代代不知名的讀者。王禹偁藉記文寄託個人情志，且冀望後人修葺竹樓，使之不朽，而蘇門文人卻試圖在建物記中寄寓一段萬世不可磨滅之理，表達對永恆不朽的想望。

68 宋·王禹偁，《小畜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四部叢刊初編縮本）。

69 魏·曹丕，《典論》〈論文〉（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1。

70 宋·蘇軾，《蘇軾文集》，卷49〈與謝民師推官書〉，頁1419；卷53〈答毛澤民〉，頁1517；卷49〈答劉沔都曹書〉，頁1430。

71 宋·黃庭堅，《黃庭堅全集·正集》卷16，頁424-425。

72 宋·晁補之，《雞肋集》卷30，頁204-205。

六、結 論

清人方苞曾說：「散體文惟記難撰結」，「徒具工築興作之程期，殿觀樓臺之位置，雷同鋪序，使覽者厭倦，甚無謂也」，⁷³指出建物記撰寫的陳套因襲。而北宋蘇門文人的「亭臺堂齋軒」記，幾乎不述建物興作之程期，轉以「人」為主，「建物」往往只是象徵人的風雅的存在，其作用在於供人登臨、燕居，當文人置身、優游其間時，建築似乎已不存在了，成為精神空間的表徵；⁷⁴其次，對地理景觀、自然山水輕描淡寫，相對地強化了歷史人文意識，流露文人的襟懷；此外，蘇門文人的建物記可以說是略於寫景、敘事，精於論理，他們共通的群體特色，集中呈現記體變異後的新面貌。

命名與釋名可以說是蘇門文人的建物記的重心，由此展開議論說理，或以理遣情，或以理勉人，理的析辨固然缺乏鮮明的形象，但文中往往寄寓一段萬世不可磨滅之理。前文曾提及錢穆云「宋人記亭閣，記齋居」尚有「運詩入文之遺意」，以為「宋人亦不自知」。「亭臺堂齋軒」為私人燕居之所，文人往往藉這類詩文（包括詩賦銘記）寄託個人情志，其文學性原本就較其他題材的記文濃厚。而宋代文學「尚意」、「主理」，具理性思辨精神，反映宋型文化的特徵，⁷⁵蘇門文人生長於宋哲宗元祐前後，正是宋文化成熟期，⁷⁶

73 清·方苞，《方苞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卷6〈答程夔州書〉，頁166。

74 建築學者漢寶德在〈中國人的庭園〉一文中云：「唐代以前的文章，如〈魯靈光殿賦〉有相當多的文字描寫了建築的本身，唐代以後，膾炙人口的名作，如王勃〈滕王閣序〉、范仲淹的〈岳陽樓記〉則完全擺脫了宮廷派的寫實作風，而順著王羲之的〈蘭亭集序〉的傳統，發抒感懷，描述景物，建築則成為一個情與景的參考點，建築是不可缺少的，然而它的重要性乃供文人雅士登臨，並提供一個動人的景觀，當文人們陶醉其間的時候，建築已不存在了。」收入氏著，《風情與文物》（臺北：九歌出版社，1993），頁202。筆者以為不只是提供動人的景觀，宴賓客、閱圖書、觀文物等，文人亦優游、陶醉其間，精神空間的意涵超越建物的本身。

75 可參見龔鵬程，〈知性的反省——宋詩的基本風貌〉，收入蔡英俊主編，《意象的流變》（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2）；張高評，〈從會通化成論宋詩之新變〉，收入氏著，《會通化成與宋代詩學》（臺南：成功大學，2000），頁1-50；王永照，〈宋型文化與宋代文學〉，《宋代文學通論》緒論，頁1-43。

76 胡曉明《中國詩學之精神》（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第3章〈弘道〉中云：「宋文化之發展，經慶曆、熙寧而至元祐，遂成為與唐相異的宋型文化」（頁96），胡氏亦參考龔鵬程，《江西詩社宗派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3）一書中所云：「宋文化始胚

其詩文亦自然反映「尚意」、「主理」的特質，或許為錢氏所謂「亦不自知」，但我們從蘇門文人的文章中，可發現他們對「記」體創作頗有高度自覺，主要因建物記文必須刻石，不易隨建物一起損毀，蘇門文人似乎欲以永恆普遍的「理」召喚、啓示後人，誠如明人吳訥所云「雖專尚議論，然其言足以垂世而立教，弗害其為體之變也」，換言之，蘇門文人以論作記，取代自然山水的永恆意義，以鑄於金石之「記」文開示世世代代讀者的智慧，具有深遠意義。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魏·曹丕撰，清·孫馮翼輯，《典論》，北京：中華書局，1985。
- 晉·陶淵明撰，楊勇校箋，《陶淵明集校箋》，臺北：正文書局，1987。
- 唐·韓愈撰，馬通伯校注，《韓昌黎文集校注》，臺北：華正書局，1986。
- 宋·蘇舜欽撰，傅平驥等校注，《蘇舜欽集編年校注》，成都：巴蜀書社，1991。
- 宋·王禹偁，《小畜集》，四部叢刊初編縮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
- 宋·李昉編，《文苑英華》，臺北：大化書局，1985。
- 宋·姚鉉編，《唐文粹》，臺北：世界書局，1972。
- 宋·歐陽修撰，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臺北：中華書局，2001。
- 宋·曾鞏撰，陳杏珍等點校，《曾鞏集》，臺北：中華書局，1998。
- 宋·蘇軾撰，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
- 宋·蘇轍撰，陳宏天等點校，《蘇轍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
- 宋·黃庭堅撰，劉琳等點校，《黃庭堅全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
- 宋·秦觀撰，徐培鈞箋注，《淮海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 宋·晁補之，《雞肋集》，四部叢刊初編縮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
- 宋·張耒撰，李逸安等點校，《張耒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
- 宋·陳師道，《後山詩話》，歷代詩話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91。
- 宋·汪藻，《浮溪集》，四部叢刊正編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
- 宋·釋惠洪，《石門文字禪》，四部叢刊初編縮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
- 宋·謝枋得，《文章軌範》，四庫全書珍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

於元和貞元，坎陷於晚唐五代，復興於慶曆，而定型大成於元祐，宋人故自知之。」頁204。而蘇門文人即為元祐前後的重要詩人。

- 明·吳訥等，《文體序說三種》，臺北：大安出版社，1998。
- 清·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臺北：世界書局，1982。
- 清·董誥等編，《全唐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 清·方苞，《方苞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清·姚鼐編，《古文辭類纂注》，臺北：世界書局，1972。
- 清·沈曾植，《海日樓札叢》，臺北：河洛出版社，1975。

二、近人論著

- 王水照 2000 〈宋代散文的技巧和樣式的發展——宋代散文淺論之二〉，《王水照自選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頁 421-431。
- 王水照編 2000 《宋代文學通論》，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
- 王基倫 2001 《唐宋古文論集》，臺北：里仁書局。
- 何寄澎 1990 《唐宋古文新探》，臺北：大安出版社。
- 胡曉明 1993 《中國詩學之精神》，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 姜濤 1990 《古代散文體概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 柯慶明 2000 〈從亭臺樓閣說起——論一種另類的游觀美學與生命省察〉，《中國文學的美感》，臺北：麥田出版社，頁 275-349。
- 張高評 2000 〈從會通化成論宋詩之新變〉，《會通化成與宋代詩學》，臺南：成功大學出版組，頁 1-50。
- 許銘全 2004 〈「變」「正」之間——試論韓愈到歐陽修亭臺樓閣記之體式規律與美感歸趨〉，《中國文學研究》19: 25-66。
- 黃明理 2002 〈淺談命名文學及其在北宋的開展〉，收入輔仁大學中文系主編，《建構與反思——中國文學史的探索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頁 659-690。
- 蓋琦紓 2002 「蘇門與元祐文化」，臺北：臺灣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
- 褚斌杰 1990 《中國古代文體概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錢穆 1979 〈雜論唐代古文運動〉，收入羅聯添編，《中國文學史論文選集（三）》，臺北：臺灣學生書局，頁 993-1038。
- 漢寶德 1993 《風情與文物》，臺北：九歌出版社。
- 蕭馳 1986 《中國詩歌美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龔鵬程 1982 〈知性的反省——宋詩的基本風貌〉，收入蔡英俊主編，《意象的流變》，臺北：聯經出版公司，頁 261-316。
- 龔鵬程 1983 《江西詩社宗派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Aesthetic Significance of the Su School's Private Building Records

Chi-Shu Ko *

Abstract

Narratives such as the “*Tingtaitang* 亭臺堂 Study,” in the miscellanies from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describe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loisters where literati were accommodate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inner space in the buildings, however, often surpassed the buildings themselves, especially since the writers of Tang-Song classical prose were able to master this type of narrative. Most narratives in the “*Tingtaitang* Study” have strong implications for literature, and hence, elevate the aesthetic value of Tang-Song classical prose.

The “Su School” in this study refers to the literary group led by Su Shi 蘇軾 (one of China's great poets and calligraphers) and other intellectuals including Su Che 蘇轍, Huang Tingjian 黃庭堅, Qin Guan 秦觀, Chao Buzhi 晁補之, and Zhang Lei 張耒, who were also very important figures during the early 11th century (Northern Song Dynasty) in terms of their literary accomplishments. Although the six of them exhibited differences from one another in terms literary style, they had something significant in common. Their “*Tingtaitang* Study” reveals the inclinations of the minds of the literati as well as their personalities. Furthermore, they excelled in argumentative articles, followed by descriptive and narrative compositions. They replaced their argumen-

* Chi-Shu Ko i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in the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at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tative methodology with a narrative methodology, urging a revolution in *jiti* 記體 prose (similar to narrative prose), which had once focused on narration. In their works, an invincible truth was always cited in order to inspire the readers. These works truly reflect the aesthetic qualities and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ets in the Song Dynasty: abstraction and reasoning.

Keywords: *guwen* 古文 (ancient-style prose), *jiti* 記體 (narrative prose), *Tingtaitang* 亭臺堂 Study, Su Shi 蘇軾, Song dynasty